

科学发展观专题报告之五

# 冲突之源与忧患之省

国防理论研究资料编写组

本资料仅供战略研究班内部交流 严禁复印

# 科学发展观专题报告

## 之五

# 前言

当今,全世界都在研究中国,因为中国在崛起。

但是,地球版图自上个世纪之后就已经基本固定。一个新兴大国的崛起,不可能不引起一场地震,而这场地震只有我们自己没有觉察,这是自欺欺人。

各级领导特别是高级领导干部,要有兼听的风度,要有偏见的视角,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审视自我,然后才能避开深坑,躲过天外飞石。

这是一本由高级领导推荐,总部机关整理的一份参考资料。编者百次地阅读和删除,希望能减少点内容,但是确实难以割舍!

希望这样的他山之石,变为我们雕琢自己美玉的工具吧。

编者

# 目 录

|                        |     |
|------------------------|-----|
| 中国利益与全球贸易自由化 .....     | 1   |
|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         | 4   |
| 战争和意识形态 .....          | 16  |
| 恐怖主义全球化 .....          | 23  |
| 战争私有化 .....            | 31  |
| 全球化与共同发展 .....         | 40  |
| 科学工作者的祖国 .....         | 46  |
| 为什么人的大是大非 .....        | 56  |
| 一超独霸的美国与人民战争 .....     | 62  |
| “黄祸”加“绿祸”的世界大战 .....   | 74  |
| 未来战争与美国的军事力量 .....     | 83  |
| 千百万印第安人和非洲黑人哪去了? ..... | 88  |
| 恐怖主义也是战争手段 .....       | 98  |
| 异化的战争 .....            | 104 |
| 防止思想的庸俗化 .....         | 110 |
| 大国冲突 .....             | 118 |
| 麦克纳马拉的管理革命 .....       | 124 |
| 增强忧患意识 .....           | 127 |
| 美国跨世纪战略:全球美国化 .....    | 143 |
| 美国霸权泡沫化 .....          | 154 |
| 五角大楼的新地图 .....         | 163 |
| 必须服从具有中国特色的总体战略 .....  | 167 |
| 美阿心理作战分析 .....         | 176 |
| 充分计算成本和收益的战争 .....     | 183 |
| 全球化与共产党(选摘) .....      | 191 |
| 四因素可能使经济矛盾集中爆发 .....   | 215 |
| 新自由主义缘起考 .....         | 222 |

# 中国利益与全球贸易自由化

卡拉斯

中国势不可挡的经济发展使世界为之改变。对发达国家来说,只要调整经济战略就能应付。但中国的崛起对贫穷国家有何影响?亚洲、拉美、中东欧国家的政府都密切关注着中国这一出口核心,担心无法保留国内制造业的就业岗位。这种忧虑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严格分析起来,中国的发展将有助于而不是破坏大多数发展中国家。中国经济的发展——榜样的力量——将推动全世界的脱贫行动。

目前,中国在北美、欧洲及其他地区的出口市场占有了很大比重——这些市场都是贫穷国家所觊觎的。对很多国家来说,这可能意味着困境,但事实上中国已成为发展中国家最佳的出口目的国。中国每年 4000 亿美元的进口中 45% 来自发展中国家,2003 年从发展中国家进口的额度增加了 550 亿美元。事实上,中国在和发展中国家的贸易中存在逆差。中国对基础产品(主要产自贫穷国家)的需求非常强大,已引起粮食及铝、钢、棉花、橡胶等原材料的价格不断上涨。对全世界数以百计的依靠这些产品收入的农民国家来说,全球物价上涨来得正是时候,改变了几十年来不断下跌的情况。

同时,中国也成为有效的地区性贸易圈的中心,有利于亚洲各发展中国家。的确,中国消耗了大量原材料,但五分之四的进口原料都已成为工业品包括办公器材、电信设备、电器等。而周边国家通过出口部件和机器组件到中国,最后在中国完成产品装配。韩国和台湾获利最大,2004 年菲律宾、泰国、印度尼西亚对中国的出口大约也上升了 30%。其他地区性生产网络也在发展,尤其是汽车和服装行业。因此,即使某个部分衰退了,各国的赢利仍可持续。

中国的经济影响很大,同时它的榜样作用也非常强大。它成了开放市

场取得的成就的最好展示,使得贸易如何减少全球贫困的争论获得更新。随着它遵循世界贸易组织越来越严格的规定,中国自由贸易的资格也在不断增强。例如,全球纺织品和服装的配额制度自 2005 年 1 月 1 日起将被取消。如果经济自由化能使中国 9% 的增长率持续 30 年,并使三亿人口脱贫,那么其他国家必然也能从打破贸易壁垒中获益匪浅。

和中国的记录相比较,贫穷国家发展缓慢的标准借口——不公平的全球竞争和外国投资者的剥削——失去了可信度。有实例表明,中国的榜样正在起作用。在 20 世纪 90 年代印度的改革和迅速发展中,中国的榜样可能起到重要的催化作用。拉美国家也开始注意中国的作用:智利和中国正计划签订自由贸易协定,墨西哥和巴西都派出高级贸易和投资使团到中国考察。随着中国开始和周边国家实施自由贸易协定,东南亚国家可能受益更多。

在共产主义的全盛时期,北京就一直拥护发展中国家的利益,至少在它自己的粉饰中是如此。如今,作为一个强大繁荣的贸易国,它处在更有利的位置,能够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意愿、规定世贸组织和其他国际组织中的制度来处理发展问题。在 20 国论坛中——发达国家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交换意见的地方,中国已非常活跃。很多情况下,中国利益恰巧和其他发展中国家一致,因此很多发展国家向中国寻求支持。例如,中国希望推动全球农业贸易更加自由化,对贫穷国家来说这也是一个关键问题。同时,在发展中国家呼吁保护服务业的呼声中,也能听到中国的声音。

当然,中国崛起也的确让一些国家付出了代价。由于中国的需求拉高了价格,那些依靠产品进口的国家遭受了打击。由于全球纺织品配额制度的取消,而中国的服装生产效率很高,很有可能控制世界纺织品市场。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将危及如孟加拉国、柬埔寨等国的服装工人,他们的工作是靠有保护的市场来维持的。由于担心即将到来的中国的竞争,中亚向美国优先出口的来料加工产业已逐渐退出市场。同样,随着全球贸易壁垒的消除及像中国这样高效率的生产者开始参与竞争,世界的贫穷国家通过和美国、欧洲自由贸易协定进行贸易所能得到的利益将不断减少。但是,中国经济崛起和更加自由、公平的全球贸易体系所带来的利益仍将超过付出的

代价。

几十年前,日本、德国和韩国向世界展示了如何依靠出口工业品来发展经济的策略。中国的崛起也可能同样成为具有说服力的典型,证明开放型经济能够促进经济飞速发展。对发展中国家来说,这是值得效仿而不是惧怕的事。

# 重新认识中国历史

韩德强

如果给中国古代历史选定一些关键字,一般人可能会想到:封建社会,封建地主,小农经济,专制,中央集权,腐败,吃人,人身依附,禁锢,愚民政策,愚昧,停滞,落后,保守僵化,缺乏创新,服从,假道学,王朝周期性崩溃,农民起义,士农工商,重农抑商,阻碍资本主义发展,闭关锁国,盲目自大等等。相反,西方社会则是工业社会,民主,法制,文明,独立,自由,平等,进步,创新,个性解放,资本主义,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革命,开放,持久稳定,联邦,廉洁高效。“孰优孰劣,清清楚楚!”

这种东西方黑白分明的对比,自鸦片战争以来逐渐成为学界、政界、工商界的主流舆论,甚至成为国人的常识。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尽管从政治上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但在思想意识上,则仍然自觉低人一等。建国后多次知识分子挑战政权,要求走西方化的道路的运动,其信心正来源于此。1978年以后,中国社会各界几乎都默认西方化的政策选择,其依据也正在于此。

作为80年代睁开眼睛四处张望的新一代,我当然也接受了这份黑白鲜明的东西方对比图景。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全面展开,随着对市场经济理解的加深,随着新史料的出现和旧史料的重新解读,我逐渐认识到一个全新的中国古代史,并进而对近现代中国历史有了新的理解。

如果《管子》有史料价值,则中国自夏朝起即有私有制和市场经济到春秋战国时期,各国的商业网已经形成。《管子》的说法是,“万乘之国必有万金之贾,千乘之国必有千金之贾。”即一个国家的人口越多,市场越大,则大商人的资产越多秦统一六国后,随即统一度量衡、货币和文字为全国范围的物资运输和交换奠定了制度和物质基础汉朝吸取秦的教训,轻徭薄赋这是

中国历史上一段极其重要的经历。从西汉初期放任自由的经济政策，一转到西汉中期的杀商政策，统治者懂得了，商人具有积聚社会财富的强大力量，必须“重农抑商”，才能平衡商人和农民的利益。从此，历届政府都将重农抑商作为基本国策

重农者，重视实际从事生产的农民和农业，抑商者，既抑制城市商业流通，亦抑制农村土地兼并现代西方的大资本家，正如古代中国的大资本家一样，从来就是依靠垄断地位发财，从来就是与国家政权相互倚重、勾结的。

在古代经济思想中，重农抑商等价于“重本抑末”。“本”是生产，“末”是流通。事实上，重生产而抑流通，“重本抑末”或“重农抑商”，这是任何市场经济体制都必须采用的政策。市场鼓励创新，能够促进生产技术的改进，商品的丰富，大型组织的形成，资产阶级的强大，但同时则“强者愈强、弱者愈弱”，促使社会两极分化，进而发生动荡。怎样才能保留市场的创新性和丰富性，又抑制市场的两极分化特性呢？这就必须“重农抑商”。欧美国家的高额累进所得税、遗产税、赠与税，以及相应的失业救济、养老金等福利措施，工会集体计价还价制度，客观上就是在抑制商人成长的速度，保护生产者的利益，抑制两极分化的程度。因此，实际上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当然，似乎“重产抑商”的提法更直观一些。此外，还有战后德国、日本企业高速成长的秘密武器，加速折旧政策，也是一种重本抑末措施。加速折旧后，企业可分配利润大幅降低，但用于扩大再生产的资金却异常充裕，这难道不是“重农抑商”、“重本抑末”吗？

孙中山先生早年考察欧美，发现欧美社会虽然强大，但两极分化极其严重，劳动人民终年当牛做马，生活朝不保夕，设想未来的中国社会应该是三民主义。其中，民生主义的要害在于节制资本。这是富有远见和哲理的政策。节制资本不是消灭资本，也不是放纵资本。这正如重农抑商，不是消灭商人，也不是放纵商人。

中国古代重农抑商和放任自由的长期争论，其实等同于西方经济学中国家干预与放任自由的长期争论，其前提都是市场经济。争论之所以是长期的，因为推动争论的社会机制和动力是长期的。受益于市场的大商人总是主张放任自由，而受害于市场的生产者，农民和工人，则总是主张国家

干预。

重农抑商政策是否阻碍了经济的发展呢？从短期看，应该如此。由于重农抑商，资本积累速度会放慢。但是，从长期看，则恰好相反。如果采用放任自由政策，则一个王朝将在30、50年内完成两极分化过程，引发农民起义，中断土地兼并和资本积累的过程。如果采用重农抑商政策，则一个王朝寿命可能长达二、三百年。相应地，资本积累周期将放长，积累规模将变得更加巨大。经济史料支持这种逻辑分析。从1500—1800年，在这长长的300年间，中国拥有巨额国际贸易顺差，是世界经济和贸易的中心。

李约瑟的《中国科学技术史》认为，从公元三世纪到十三世纪，技术的流向主要是从中国经阿拉伯向欧洲流。在炼钢、铸铁、造船、水轮联动擒纵机构、转换直线和圆周运动的机械装置，当然还有四大发明——造纸、火药、印刷、指南针上，中国都领先于西方几个世纪至十几个世纪。一些对西方极为仰慕的中国学者很不高兴看到李约瑟的著作，甚至千方百计加以否认。因为李约瑟发现了一个繁荣、增长迅速、富于创新、技术先进的古代中国。

如果上述叙述成立，则可以看出，在王朝初期，重农抑商政策的确将放慢资本主义社会到来的步伐，但是，由于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倾向极其强烈，资本主义社会还是要顽强地到来。从各王朝中期起，以大地主、大商人和大官僚为主体的资产阶级成为社会的主导经济力量，这种力量最终将摆脱政府的调节，将政府权力市场化、资本化，使社会崩溃。

也就是说，恰恰是市场经济的两极分化机制，导致了资产阶级财富的积聚和无产阶级人数的壮大。与此同时，权力体系也日益失去制约，权力集中到少数谋求短期私利的权臣、宦官或外戚手中。资本的积聚与权力的积聚相互推波助澜，社会财富完全集中到一小撮人手中，社会必然崩溃。

资产阶级是一个非常务实的阶级。他们当然希望自己能够掌握政权。但是，如果别的政权一样允许他们积累资本，发财致富，为什么一定要自己掌权呢？其次，如果政权掌握不好，或者政权的运作成本过高，或者在各阶级之间达不成政治妥协，反而会引火烧身。第三，无论谁掌权，都需要避免社会两极分化，都需要使最下层的群众能够勉强生存下去，使其反抗的机会成本高。这就需要支付税收，而且肯定是越富有，掏的钱越多。第四，如果

不掌权，一旦社会发生动荡，还可以用脚投票，逃离或隐藏，掌了权反而跑不了。所以，资产阶级愿意与任何允许他们积累资本的政权合作。如果这个政权采取放任自由政策，招商引资，亲商亲资，那当然最好；如果这个政权重农抑商，节制资本，也可以接受。反正节制资本的种种政策是由官员来执行的，资本家有的是办法腐蚀、拉拢官员，使节制政策失效。第五，在多数人普遍自利的情况下，任何政府，哪怕是敌视资本家的工人政府，都不得不允许市场经济在一定范围内的存在，从而允许资产阶级的存在，那么为什么一定要费尽心机掌握政权？

因此，中国古代的资产阶级接受王朝政治的调节，在王朝政治下发展，并腐蚀王朝政治，最后与王朝一同被周期性地消灭，这是完全可以理解的。

革命的动力是“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当阶级分化达到极点时，该社会就将爆发革命。革命的方式是形成革命组织，团结一切革命力量，推翻反革命政权。革命的结果则取决于领导集团的思想。当领导集团是陈胜、吴广时，革命将只能完成王朝更替。当领导集团是毛泽东式的理想主义者时，革命政权就可能成为人民政权，就有可能使社会财富分配倾向于运动者，并且使运动者联合起来，兴修水利，建设工厂（如果有现代工业），改进技术，还有可能使旧社会遗留的“人不为己，天诛地灭”的价值观得到重大改变。当然，如果领导集团中毛泽东少，而陈胜、吴广多，则经过一段时间后，社会仍将恢复王朝时代。

古代中国农民起义的失败，并非是由于生产力水平低下，而是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在牢固地统治着人们的思想。相应地，如果旧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不变，哪怕发生在最先进的工业国的革命，也只能是改朝换代、历史循环。

这些年来，在历史学界、政治学界、社会学界、哲学界乃至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界，普遍流行着新自由主义的历史观。面对着日益加深的剥削和压迫，日益严重的两极分化，学界普遍认为，这是中国摆脱封建社会、进入资本主义社会的代价，是历史进步的代价。这种态度固然与学界被廉价收买有关，但不能不说，也与新自由主义历史观的长期熏陶有关。

资产阶级自我宣传、自我标榜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以批判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为旗帜的理论家，对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进行历史肯定。在这一逻

辑中,第三世界各国被贴上了封建社会的标签,可以任意由“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以历史进步的名义加以杀伐掠夺;在生产力还可以继续发展的历史阶段内,本国的工作则只能继续遭受残酷的剥削和压迫。同样在这一逻辑中,第三世界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被贴上了早产儿的标签,被剥夺了历史合理性。

“落后就要挨打”,这是历史学家总结近代中国历史得出的经验教训,已经成为普通中国人的常识。然而,更加仔细地观察近代中国历史可以发现,更加准确地说法应该是,“腐败就要挨打”。

1840年的鸦片战争发生时,中国人口和经济总量仍然位居世界第一。即使在纺织工业上,西方的纺织品远洋万里来到中国,也失去了成本优势。因此,英国不得不继续用鸦片代替白银,支付对华贸易的逆差。英国的真正优势在军事装备上,其坚船利炮令清政府胆战心惊。但是,一支区区4000余人的英国海军,就算有海上优势,是很难远离本土,战胜一个四亿人口的上百万军队的大陆国家的。更何况,清军与英军的武器装备的差距,远远小于110年后人民解放军与美国军队的差距。事实上,在林则徐、邓廷桢的布防下,广东虎门和福建厦门海防坚固,英军不敢进犯。而浙江定海及天津大沽防区,则由于将领腐败无能而缺乏防御能力。英军避实就虚,拿下定海,直逼天津,震动清廷,迫使道光皇帝解除主战派林则徐、邓廷桢的职务,启用主和派琦善等,才使鸦片战争失败。

甲午海战的情况亦相似。经过多年的洋务运动,北洋水师的军舰和武器性能略胜日本,但是,政权处于王朝末期,官僚腐败不堪,士兵纪律涣散,训练有名无实,终于败在日本手中。

相比之下,共产党军队武器装备极差,靠偏僻落后、人口稀少的山区取得给养,却能够屡屡战胜以全国之力、洋人之助装备和训练起来的国民党军队,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一个极其高效的组织体系。该组织体系上下同心,军民合力,领导者身先士卒,将领同心同德,战士视死如归。共产党军队的制度相当粗糙,既不如西方军队,也不如清朝军队。但是,强大的精神力量不但弥补了制度缺陷,甚至弥补了物质匮乏而带来的战斗力下降。

强调精神力量,则恰恰是中国文化的根本特征。周以百里地而有天下,

这是中国儒家立论的基础。孔孟之徒到处游说君王,希望他们能够实行王道,但四处碰壁。到董仲舒时,表面上“独尊儒术”,而实际上是让王道成了霸道的手段。毛泽东领导下的共产党在理论上反儒家学说,实际上却真正落实了儒家的王道思想,形成了一个效率极高的组织体系,足以战胜在物质上数十倍乃至上百倍于自身的敌人。在建国以后,这个组织的精神力量吸引了海内外的许多自然科学家,在短短一段时间内爆炸了原子弹和氢弹,研制出了卫星、火箭和导弹,形成了完整的、独立自主的现代科技和工业体系,初步实现了百年强国梦。

换言之,一部中国近现代史,并非如某些舆论所强调的,必须全盘西化才能够强大,而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才能够强大。清末洋务运动之所以失败,并非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方针错误,而是“中学并没有为体”的错误。慈禧怎么有资格代表“中学”呢?一个见识短浅、权欲熏心的当政者与儒家所希望的圣人君子,相去何止十万八千里?与洋务运动同时,日本开始了明治维新,其口号是“东魂西体”,与中国的“中体西用”如出一辙,日本不是成功了吗?

有人可能会说,中国靠精神力量固然可以取得一段时间的成功,但不如靠制度建设持久。但是,建设制度、维护制度、更新制度,这一切难道不需要精神力量吗?辛亥革命后,中国搞过一段议会选举,但是参与者不是利用议会制度为国家利益服务,而是利用议会为集团乃至私人利益服务,结果“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引来了袁世凯当皇帝的闹剧。改革开放后,如果仅强调用个人利益调动人的积极性,义利之辨被完全颠倒,恰恰应了儒家的先见之明,“上下交征利则国危”,贪污腐败就会渗透到权力体系的每一个角落,出现权力与资本紧密勾结,社会两极分化,国家利益被廉价拍卖,经济和社会险象环生。虽然制度叠床架屋、左右牵制,但是相互牵制变为层层合谋,腐败倒日益集体化、制度化了。

有人可能会想,这不是制度化的问题,而是制度化不彻底的问题。那么,怎样算彻底呢?有人会答:当然是三权分立、多党政治、民主选举。然而跨国公司和本国官僚、买办集团操纵选举,政党轮流坐庄分肥,这是第三世界各国采用西方政治制度的普遍现实。欧美国家的政府实际上是“资产阶

级共同事务的管理委员会”。在资源充沛、市场繁荣、社会矛盾缓和的年代，这种政治制度的确可以较好地协调各资本集团之间的利益冲突，缓和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间的矛盾。一旦上述条件有一个或多个不具备，则西方政治制度就可能法西斯化。德国、日本、意大利即如此。即使在美国，20世纪30年代也是一个法西斯主义思潮泛滥的年代。20世纪50年代初，麦卡锡主义充分展示了美国政治制度法西斯化的潜力。新世纪之初，由于遭到恐怖主义袭击，美国公民的消极的政治自由事实上又受到了严重侵犯。在外交政策上，美国抛弃了贵族共和、开明专制的形象，一味迷信武力，相信“朕即天下”，独断独行。

越来越多的人已经意识到，西方政治制度连同工业革命的成就，是以过去的世界留给人类的丰富的矿产资源、良好的自然环境、深厚的宗教和道德资源为前提的。然而，一波波的工业革命耗竭了宗教和道德资源，西方社会的技术、经济和政治模式正在或已经将人类带上了穷途末路，毁灭性的前景依稀可见。

因此，到了反省市场迷信的时候了。地球上60亿人相处，不可能没有市场，也不可能离开制度，但绝不可以只有市场，也绝不可以只靠制度。建设和维护一个良性的制度和市场，需要有一大批具有人类共同体精神的先知先觉者。对此，荀子有过精辟的论述：“法者，治之端也；君子者，法之原也。”

市场和制度，是与人的物质性相联系的；道德和理想，是与人的精神相联系的。人不可能没有物质性，因此不可能没有市场和制度由于多数人的物质性高于精神性，对短期和个体利益认识得更清楚，因此社会不可能离开制度；但是，如果所有人都把短期和个体利益置于长期和整体利益之上，则制度不可能持久，社会亦将随之瓦解。更进一步，离开了人的精神性，离开了少数精神性高于物质性的人，任何社会组织，无论是部落、企业、家庭还是国家，将既不可能出现，亦不可能持续，更不可能壮大。

文化大革命期间，人的物质性一度受到忽视。社会主流舆论要求“人为尧舜”、“狠斗私字一闪念”，破除“管、卡、压”，即破除制度。这是在一个极端上。文革结束后，社会舆论在底下普遍蔓延向另一个极端，认为人就是自

私自利的物质性的动物,谁倡导高尚、谁提倡集体主义,谁就是虚伪,谁就是压抑人性,谁就是反人性。自私的人在市场中相互竞争,在制度中相互约束,就可以促进社会的进步。结果,权钱勾结,两极分化,资源浪费,环境破坏,自主的工业和技术体系瓦解,社会离散倾向急剧增强。

我们能不能变得聪明一些,懂得制度和文化、物质和精神的平衡,而不是在两个极端之间来回摆动、往复震荡、相互否定呢?

认识极端,才知道执中不变——中庸——的必要。遗憾的是,中庸一词已经被妖魔化了。人们常常认为,中庸就是和稀泥,老好人,不倒翁,无原则,保守,僵化,不思进取,甚至是封建文化的巨大毒瘤。

实际上,社会是由无数人组成的,每个人,每个家庭,每个企业,每个社区,每个国家,都倾向于扩张自己的利益,从而使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成为利益冲突和较量的战场。追求自身利益,这是一种把社会拉向极端,拉向四分五裂的力量。经过多重合作和斗争以后,就产生了放任自由和尚农除末、自由贸易和闭关锁国、市场和计划、技术和资源、短期利益和长期利益、局部利益和整体利益、制度和文化、物质和精神、利己和利他、唯物和唯心等两种极端原则的争论。如果不懂得在两种极端的原则、极端的力量之间保持平衡,那么社会就只能在两个极端间摆动,造成重大的社会动荡。英国史学家霍布斯鲍姆把 20 世纪概括为《极端的年代》,这是极为深刻的。自以为文明、进步、现代化了的西方社会,以及向西方学习的东方社会,事实上都摆动在两个极端之间。在现代武器和技术条件下,这种摆动的代价是极为惨重的。不仅仅是一战、二战,不仅仅是资源耗竭、环境破坏,如果我们不懂得人类社会的整体和长远利益的重要性,强权者执意走极端,那么人类的灭绝很可能就在不远的将来。

因此,问题并不在于中庸原则,而是不知道什么是极端。但是,更加微妙的问题是,谁、通过什么原则来把握社会的中庸。在儒家学说中,是圣人来把握中庸:“圣人执要,四方来效。”柏拉图实际上也是这个意思,让哲学王来领导社会。在近代以来的西方社会中,是追求自身利益的政治力量的相互制衡,即民主,来达到社会极端力量的平衡,即中庸。按孔子和柏拉图的理论,近代西方的民主政治显然是一厢情愿。因为社会的各种政治力量在

此消彼长,其平衡点在时刻变化。更进一步,此消彼长的基本逻辑是“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直至弱者被剥夺到“反抗的机会成本为零”的绝望境地而与强者同归于尽,然后再开始新一轮循环。这怎么可能保持平衡?再进一步,政治力量演化同样服从“强者愈强、弱者愈弱”的逻辑,客观上使社会越来越背离平衡,抛弃民主原则,使民主制衡的理想成为专制独裁的现实。希特勒时代的德国,麦卡锡时代的美国,当今国际政治舞台中的美国,就都是典型的例子。更加隐蔽而重要的事实是,美国国内的民主政治实际上是大资本、大财团的联合专政。在大资本、大财团之间,政治力量此消彼长,其中任何一个财团都尚不足以操控经济、政治和军事(20世纪初叶的摩根财团曾接近过这种地位)。但是,他们的确控制了商界、政界、舆论界和学术界,使任何一位当选的总统都不可能代表占美国人口绝大多数的工薪人士的利益。从这个意义上,美国国内的政治力量亦早已失去平衡。如果不是前苏联在国际上对美国构成制衡,美国的强势政治集团根本不可能做出让步,建设什么福利国家。一旦失去前苏联的制衡,美国国内的工会就衰落,福利就遭到消减,民主权力就受到侵犯,露出专制的獠牙。

人类历史的演化基本动力是自利。在自利的动力下,通过战争和贸易两种主要途径,人类社会的规模变得越来越庞大,联系越来越复杂,专业分工越来越细致,财富越来越多,但是,中央集权程度越来越高,个人的自由和权利日益受到限制,民主日益成为一个欺骗性的名词、一种乌托邦的幻想。正是察觉到这种趋势,所以,任何坚决要求个人自由和平等、政治民主的人,只能选择反对这种趋势。这就是老子主张“小国寡民”的理由。

令人深思的是,主张彻底民主的老子,在中国曾经被当成是开历史倒车的没落贵族阶级的代表;而共同向往小国寡民,却在客观上为大资本专政缝制了民主外衣的卢梭,成了民主的代表人物。为什么同一倾向的思想家,在西方就成了好人,在中国就成了坏人呢?中国人的自我贬损为什么能够到如此黑白颠倒的地步呢?

改变世界首先要认识世界。当今世界,无论是经济上、政治上、军事上、文化上,其权力的集中程度都达到了以往任何时代、任何帝王都不敢设想的程度。面对一个如此高度集权的世界政治经济体制,民主的呼声不但没有

能够阻挡专制的脚步,甚至使专制披上了民主的外衣。反对美国侵略伊拉克的全球大规模游行,在美国的巡航导弹面前是那么软弱无力。相反,支持布什对伊动武的国内民意调查,却使侵略行动合法化为多数人的意志。拉丁美洲的二百年民主试验,并没有结出国富民强的果实,相反,倒是为一小撮窃国大盗轮流洗劫肥沃的南美洲提供了政治掩护,为美国操纵拉丁美洲的各国政局提供了现成了政治机制。

可见,在人人利己的前提下,在已经高度集权化的当代世界,程序民主事实上是一味的廉价政治麻醉剂。如果程序民主能够向实质民主转化,如果集权化的长期历史趋势能够逆转,那么下对上的民主约束必须与上对己的道德自律相结合,逐渐提高全民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的觉悟因此,任何真正向往民主的人,必须使民主和道德相互促进;任何希望以程序民主为借口,行实质专制的人,就必然希望人人自利,以便对人民分而治之。不妨作一个对比。在晚清末期,由于教育体制仍然在培养以天下为己任的学生,普通人也关心议论时政,茶馆里必须挂出“莫谈国事”的条幅。然而,在 20 世纪末期的中国,大家都只关心挣钱、花钱,金钱至上,即使要求人们谈论国事,人们也已经没有兴趣。哪一个社会的民主意识强呢?

中国的思想家们都是在让人们深刻地认识人性的复杂性、需要的复杂性,认识自身,认识社会整体,认识历史,从而是开启大智慧的理论。实际上,在交通、通讯十分发达的今天,绝大多数人对社会和人性的认识不是更深刻了,而是更肤浅了。在日益庞大、集中的权力财富面前,普通人的行为越来越像只会哭闹的婴儿,只会提出要求,一遍遍地游行,一次次地示威,一场场地选举,甚至一颗颗人体炸弹,却不知道,甚至不想知道剥削压迫的深刻根源,一次次地被走马灯般轮换的、随意许诺的政客所欺骗。

中国的儒家学说与西方的程序民主相结合,可能不但是中国的出路所在,也是人类社会的希望所在。

很不幸,近代以来,儒家学说被当作了中国落后、失败的替罪羊,在“打倒孔家店”的声浪中被扔进了历史垃圾堆。对儒家学说最激烈的批评莫过于鲁迅先生的“吃人”论。

站在劳动者的立场上,说中国历史是一部“吃人”的历史,我也同意。问